

社会思考

涿州文史资料第七期（总三十期）

一亩小麦“卫星田”

——“大跃进”回忆片段

1958年秋，正是全国“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刻，农业战线争放“卫星”，电台、报纸、“特号”迭出。“多穗高粱亩产1600斤”，“玉米亩产3800斤、12000斤”，“甘薯亩产两万斤、十万斤”……

当时正在合县并县。由涿县、新城、雄县、涑水四县合并为“大涿县”。县府设在高碑店，县委书记李升，原新城县委书记石双琪，调保定地委任副书记。石书记在涿县的丰产田、试验田，设在旧新城县城北樊庄村。这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是省劳模赫树森，是种田能手。石书记指示，要在樊庄村搞一亩小麦高产“卫星田”，由县农林局魏西荣局长、农业技术股长张茂和劳模赫树森具体计划、指导、操办。

第一步是整地施肥。地块选在樊庄村北，用皮尺将地块划了出后，赫树森发动全村近一半壮劳力三四十人，用铁锹深挖地、深度为6尺，从地块的一端开始，先开出两米宽的“马道”，然后两米两米倒着挖。运肥的是妇女等劳力，用马粪十车、大粪干五车，豆饼两千斤，炒熟的黑豆若干斤，与土混合填入挖好的槽内。全部挖完和土、肥填好后，灌水。同时将一头病牛、二头驴、十多只狗御成肉块，用大锅熬成肉汤，与水一同灌入地中。等踏实、阴干后，再发动人二次整地。这次翻地就浅了，翻完地，把地面整成马鞍型，为的是增大面积。用四齿镐、铁耙，整的非常细致。这种马鞍型的地，据说（没有细算）比平

地能增加表面积三分之一。

第二步是播种。领导、技术员和劳模研究决定选用当时的优良品种“碧玛四号”。一亩播种量为 2000 斤。我当时是新毕业的学生，听说一亩小麦用麦种就达 2000 斤！吓了一跳，心想这不符合科学要求，但形势所迫自己又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只有默认了。当时他们说就让我掌秤杆，并说：“一两也不能少！”所需种子大车一次就运来了整整 10 麻袋。种子倒在大簸箩里，一色的碧玛四号，又饱满、又干净。我就一称一称的称，技术员们就往地里撒种，一共撒种三遍。将两千斤麦种一粒没剩都撒在了地里。这两千斤麦种撒到一亩凹凸不平的地里是个什么样子呢？基本上是平摆一粒挨一粒，个别地方有点小缝隙，基本没有压擦擦的。

然后是覆土。将提前准备好的、拌有肥料的湿土，撒在种子上面。覆土厚度一寸。并稍加镇压。这一亩小麦“卫星田”就算种好了。

第三步是就地计算一下未来产量。局长让我算一下，我算的结果是预计产量 20 万斤。局长说：“不行，太少。”他问：“你是怎么算的。”我说：按一株麦子分三个蘖，一个麦穗 50 粒（实际当时一般小麦平均穗粒数仅 28 粒左右），千粒重按 50 克（实际当时的珀玛四号小麦千粒重才 37 克）。这算算下来是 20 万斤。局长说：“太保守，每株分蘖至少 5 个，穗粒数至少 80 粒，千粒重就按 50 克，再算算是多少！”这样算下来是四十三万多斤。局长说：“就按这个数向石书记汇报。”真是“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产（量）！”

第四步是什么呢？我就知道了。刚把这一亩麦子种完，县里通

知我到省里进修，学气象。因为当时各行各业都搞跃进，时任中央气象局局长饶兴，也提出“全民办气象”，中央向省要人，省向县里要人，于是我就去学气象。

后来我听说这一亩小麦“卫星田”，甬说分5个蘖，一个蘖也分不出来。苗都挤在一起成了“兔子毛”，无法分蘖。仅春季就五次提苗、间苗，最后打了二百多斤，相当播种量的十分之一。

回忆起来，很惭愧。这也是自己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一是糊涂，当时真是很糊涂，跟着犯晕。学了科学，在用它的时候，又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二是明知播量太多做法不妥，不敢提出意见，该劝不劝，该谏不谏，正直和公心不足。一生下来就学做人，在关键时刻又不知道怎么做。真是既糊涂又晕头。 (2001年4月12日)

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

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正常运行的基础是一定的社会道德水平。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道德经济。应中逸先生提出：“市场经济有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是价值规律，另一只是道德规范。”没有道德约束，不讲伦理原则，无视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市场经济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市场经济之所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是因为市场像体育运动的赛场一样，能够最充分的发挥全体参加者最大竞争精神和积极性，因而能最大限度的创造和积累财富。但是，越是在全体成员尽情发挥积极性的情况下，越需要有严格的规则和良好的秩序。如果没有严格的规则和良好的秩序，如此巨大的竞争力和积极性，必然会产生出种种的混乱。而要使规则有效、秩序良好，就需要裁判员和运动员，执法者和经营者具有良好的道德。

由是言之，没有市场管理者和经营者一定的道德水准，必定是一个无序的、乱糟糟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达不起来。

当前我国市场建设的主要障碍和失序现象，其原因来自社会道德领域。

社会的道德不健康和法制不健全（我们的法制不健全重要部分在执法不公、不严，实质还是个道德问题。）不仅影响和破坏计划经济，而且更影响和破坏市场经济。在过去我们的计划经济和公有经济被缺德者破坏得够严重的了！在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和同时发

展的个体及私营经济，眼见得又在遭受缺德者的恶性破坏！

目前我们的市场存在着较严重的失序或混乱现象。以权经商，走私贩毒、行业不正之风，缺斤短尺、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乱收费、乱摊派、偷税漏税等等。这些混乱现象正在严重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些不法行为来自于极端个人主义，归根结底是社会道德的败坏。

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这些混乱现象，有人认为是计划向市场转换和市场发育初期的必然现象，以后随着市场的成熟会自然好转。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成熟甚或夭折。有人认为是法律不完备，应加紧立法、增多立法。但事实似乎是不法行为随着法律的增多而增多。有人认为是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这是自欺欺人，正是由于我们内心里的不健康思想，才去追求一些腐朽的东西。

对于上述一些观点，无需多加反驳，让我们听听老百姓的看法吧。下面是两位市民老太太的对话：甲：“不中用了，买东西越来越不会买，越不敢买，不是假冒伪劣，就是缺斤少两，处处上当受骗！”乙：“人心要是坏了，人人都变成缺德，那算怎么着都不行！”一语中的。正是由于人心或社会道德出了毛病，才产生了那些对市场经济构成威胁的不法行为和混乱现象。

市场在呼唤社会道德！

财富是人创造的，是靠人的精神创造的（所谓精神变物质）。因此，发展经济首在取得一个全社会人的最佳精神状态。所谓最佳精神状态，包括两点内容：一是工作积极性，二是纪律性或秩序性。我们

用市场经济体制来发挥人的工作积极性；我们还要用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来获得全社会的纪律性或秩序性。二者都达到最佳状态和最佳配合，我国的经济腾飞和现代化的实现就在有希望了。

（《河北日报》“理论”版 1994 年 9 月 28 日）

廉政杂谈——论谦虚和节约

谦虚和节约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两种美德。如今，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说既浅又偏。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分析、阐发，以便指导人们的行为，端正社会风气。

在精神享受上厉行节约称为谦虚；在物质享受上保持谦虚称为节约。因此，谦虚和节约，本质上都是对欲望的节制。

谦虚和节约，既有利他性的一面，又有利己性的一面。利他，才有健康、追求健康、持久的利己；追求健康、持久的利己；追求健康、持久的利己，必须利他。

关于节约。从物质财富的增减过程来看，前期的省吃俭用、厉行节约，使剩余财富逐渐积累（余粮存粮仓、余款存银行），于是才有后期生活的宽裕。从精神生活的辩证法来看，则直接就是有失必有得，即你在前期享受上的损失（节制）必然有你在后期享受上的所得（宽裕）。

如果你不实行节约，平时奢侈浪费，“有米一锅”、“有柴一灶”，有钱就花，无钱就借，那么你就不会有余财的积累，甚至还有债务，必然招至后期生活的穷困。

关于谦虚。同节约的道理一样，平时经常保持谦虚的人，必定有后来精神享受的宽裕。所谓谦虚，一是谦让，二是空虚。利益先让别人，吃亏先给自己；对别人总是多看到优点和成绩，对自己总是多看到缺点和差距，就是有了成功或成绩，也不矜夸、不自伐。这样，你在精神领域里节省下来的“价值”，就存进了周围人们的心中。积累多了就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必然有后期精神生活的宽裕。这就是所谓的积德，就是所谓谦受益。

如果你不懂得谦虚，平时见利就争、见名就上，有些微成绩就自夸自伐，那么你平时就不会有价值的积累，甚至你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所存在的价值是个负数。这样就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必然招来后期精神生活的撷据。这就是所谓的损德，就是所谓“满招损”。

保持谦虚和节约，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建立高尚、和谐的精神生活及充实、完善的物质生活，而且有益于人的健康与长寿。

真正厉行节约的人，往往是全面的节约者。不仅对物质财富实行节约，而且对时间、对人体功能和精力的利用都实行节约。作息有度不浪费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节约；对视力、听力、消化能力、呼吸、心跳能力，对一切精神刺激和精力消耗（包括烟、酒、毒、色）都讲究节约，这样就能有益于健康和长寿。

谦虚能使人保持对自然界和社会环境较广阔的适应域，因而能经

常保持宽裕、平和的心态，精神上能经常保持畅通无阻逆，从而有益于健康和长寿。

阐明谦虚和节约于实行者自身也有好处，并不是让人们从寻求自身利益的角度去实行谦虚和节约，而是为了提醒那些视骄傲和浪费为潇洒人生的人应懂得谦虚和节约于己也有益处；同时为了讲明生活中的辩证法，使人们全面认识人的行为利弊的两重性。至于中华民族所创造、操守的谦虚和节约的美德，其旨远矣，大矣！其原意是用修养的方法，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建立和谐有序的人类社会，建立人同自然界和谐共生的世界。正因为其旨之美好远大，才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不易的美德。

（涿州报 1994 年 7 月 1 日）

（补遗）——古代廉政故事

各有其宝

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人得到了一块宝玉，去给主管工程建设的大官子罕送礼，子罕不收。送玉的人说：“我这块玉，请玉匠专家鉴定过的确是块真正的宝玉，我才敢把它送给您。”子罕说：“我这个人以廉洁不贪为宝，你是以玉为宝。若是你将宝玉送给了我等于是咱们二人都把自己的宝丧失了，还不如咱们各有各的宝吧。”

[原文]：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对廉政建设的看法和建议

各位委员：

现在，我就廉政建设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对当前廉政建设形势的看法

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党中央、国务院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下的决心很大。这可以从建立各级专门机构、下发文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看得很清楚。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制定下发的有关加强廉政、清除腐败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等已达 100 多件。其决心之大，可见一斑，这里就不多谈了。

第二点，我市的廉政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从 1989 年下半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在廉政建设方面所做工作有：

建立了市廉政工作指导小组和廉政办公室。各乡镇办事处、市直各部门建立廉政领导小组 102 个（有 50% 以上的乡镇办事处的政协组长参加了廉政工作领导小组）。

市委召开部署廉政工作的动员大会 4 次；公开处理大会两次；市以下召开的动员会 800 多次。

共进行了“清理干部乱建私房”，清理技术职称中的不正之风、

“四项清理”、“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清理“三乱”等五个战役。

全市设举报箱 704 个，举报电话 23 部，聘请监督员 1610 人。

九 0 年对全市干部进行廉政考察两次，并建立了干部廉政档案。

对“七所八站”人员进行了集中整训，参加 9357 人，占总人数人的 95%。

取得的主要成绩有：

全市共揭摆出不廉洁问题 1203 件。其中贪污公款 10 件，收受贿赂 3 件，滥发奖金、实物 24 件，挪用公款 8 件，储蓄员偷支储户存款 3 件，拖欠公款 143 件，乱摊派 17 件，乱罚款 35 件，乱收费 81 件，乱涨价 181 件，私分罚没款 19 件，公款送礼 18 件，私设小金库 53 个，违法乱纪、吃拿卡要及其他问题 609 件。

清理小金库 53 个，总金额 18.7 万元，全部收回；清理拖欠公款 17.2 万元，已归还 14.7 万元；清理逾期和不合理贷款 4066 万元，追回 2587 万元；清理乱摊派 11.2 万元，乱收费 12.2 万元，乱罚款 17 万元，乱涨价 53 万元，已全部上缴财政。

共发现案件线索 41 件，立案 38 件（大案要案 12 件），其中贪污案 10 件，诈骗案 3 件，挪用公款案 8 件，其他案件 17 件。已结案 32 件，已查待结 6 件。逮捕 10 人，判刑 2 人，开除党籍 4 人，受其他党纪处分的 33 人，开除公职和辞退解聘的 78 人，降职 1 人，降级 1 人，行政记过 2 人，开除留用 1 人。

全市出现拒请拒贿 2292 人次，拒贿现金 7.9 万元，拒贿物折款 6.4 万元。

第三点，对已取得的成绩估价不能过高。

尽管廉政建设，从上到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照反腐倡廉的实际任务来说，还不容盲目乐观。群众对廉政建设取得的成绩是怎样估价的呢？去年在廉政工作考察中，无论是小组座谈，还是单人座谈，100%的干部群众都认为当前的廉政工作对于反腐倡廉有作用。但是在私下聊天中，90%以上的群众认为当前的廉政工作，对反腐倡廉没有作用。后来，我又地在正式场合说有作用、在非正式场合说没作用的人作进一步调查。问他们为什么时而说有作用，时而又说没作用？到底你认为有没有作用？这些人的共同说法是：说有作用也对，说没作用也对。说有作用是说，抓就比不抓强，假如不抓廉政建设，肯定不正之风更狂，这就叫有作用。说没作用是说：像现在这样抓法，不解决根本问题，风头过后，依然如旧或更要严重，这就叫没作用。总括群众对当前廉政工作估价的实质是：当前的廉政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刹风”作用。但是根本问题还没解决，如果稍一松劲，就会出现回潮。因此说，我们对廉政建设的成果不能估价过高，对廉政工作的形势不能盲目乐观。

二、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腐败现象较难遏止和清除，而廉洁之风较难树立。这里边的原因很多也很深，这里我只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干部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干部选拔方面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选拔方法不科学、任用程序不严格。因而往往使怀有私心的人和投机取巧的人得到提拔重用，而那些廉洁正直的人反而得不到提拔重用。怀有私心的人谋到权力之后，就以权谋私、产生腐败现象。二是选拔标准不正确。主要是没有把廉洁条件放到应有的位置和分量上。考察和选拔干部，往往重才轻德，即使过去曾经很重视政治标准但在政治标准中也没有廉洁的位置。因此，形成用“能人”而不用廉士。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廉洁干部能力低、胜任不了工作。久之，干部队伍中廉洁之士就越来越少，廉洁之风就树立不起来。

其次，在干部管理和分配制度上也存在问题：由于缺乏一套科学、有序的干部管理制度和较为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整个干部队伍纪律不明、奖惩不清、管理混乱。逐渐形成了干部队伍中的两种人有两种结果：私心严重的干部搞以权谋私、吃拿卡要、收受贿赂，不仅得不到惩罚，而且可以发财升官；清正廉洁的干部，坚持操守，不取非份所得、不要不义之财，结果不仅得不到鼓励，而且生活上陷入困境。现实生活中，按劳取酬者贫且贱，按捞取酬者富且贵。清廉之士穷困潦倒者有之，腐败之徒升官发败者也有之。我们提倡的是廉洁，但现实生活中使廉洁者贫贱；我们反对的是腐败，但现实生活中使腐败者富贵。如此，则腐败现象唯以清除，而廉洁之风难以树立。

第二个是方法措施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方法和措施不够有力。我们反腐倡廉使用的方法、措施包括：思想教育、案件查处、自查自纠、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可以说除

了群众运动之外，方法措施已够详备了。关键是这些方法和措施效率很低。

思想教育，由于存在内容陈旧、空洞、不切实际、说做不一，教育与现实脱节等弊病，目前思想教育的有效率非常低，而且直到现在尚未找到提高思想教育效率的好方法。

查处案件，是这些方法措施中最有效的一个，它的惩戒作用较大，但是，目前也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偏少、偏轻；另一个是执法不严不公。由此而减少了它的实际作用。

自查自纠，这种办法效率更低。群众说，如果人能自查自纠，他就不搞不正之风了。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这是以法除腐和实行公开监督的必用措施，而且各级机关、大小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廉政规章、廉洁守则，为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完善廉政制度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原则性规定多，搞了一些“应当”、“不准”、“必须”之类，可操作性很差。二是走形式、摆样子、不准备认真执行。也减少了规章制度的实际作用。

其次是廉政建设中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不力。

一是廉政建设队伍中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决心不大、信心不足，怕字较多、公心不足。觉得“小气候”扭不过“大气候”，怕“惹事”、怕得罪人。二是工作作风上的严重形式主义。用于应付上报、应付检查的时间和精力多，用于真正清除腐败、实现廉政的时间和精力少。因此，影响了反腐倡廉工作的进度。

三、几点建议

1. 下大力量解决干部作风问题。

第一是改革干部考核内容、改革干部选拔标准、增加干部队伍中廉洁干部的比重。建议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今后干部考核的内容，把廉洁因素的比重提高到至少 50%；今后干部选拔的标准，也把廉洁条件的比重提高到 50%；今后提拔的干部中，让廉洁之士不少于 50%。使干部队伍中廉洁因素增多，就可逐步改善干部作风问题。

第二是从干部管理和分配制度上，下决心解决廉洁干部吃亏的问题。这应做为组织人事部门的一个专门课题加以研究。要从选拔制度、奖惩制度和分配制度上去解决，而不是简单地用“表扬先进”、“宣传典型”等方式去解决。

2. 改善廉政建设的工作方法和

领导方法：

第一要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和无效的工作量，如“学习讨论”、“自查自纠”之类。要增加有效工作的分量，加大案件查处的分量。检察、监察、纪检、廉政各部门相互配合，都搞案件查处。同时改进和克服案件查处方面存在的偏少、偏轻、不严不公的缺点。

第二，从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上，多做实事、少搞形式。减少应付汇报、应付检查、应付上级之类的工作，多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下决心把形式主义革掉，把无关工作、无效工作革掉，把不负责任的思想革掉。

3.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规章制度。

由廉政办组织人力，对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检查。凡是不健全、不公开的规章加以健全、公开；凡是缺少惩戒性和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与单位一起加以修订。

4. 改革思想教育方法：

人的行为由思想支配，这就说明了思想教育对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性。问题是怎样提高思想教育的效率。这就必须改革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必须革除内容空洞、不切实际、说作不一、教育与现实脱节的弊病。换上切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内容和方法。同时在干部制度和奖惩、分配制度上给以相应配合。这应由组织和宣传部门专门研究、解决。

(1988年)

关键是治理社会思想

一、当前我国出现的社会秩序现象归根结底是社会思想问题

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在取得了重大进步之后，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问题。这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秩序现象或叫社会混乱现象。如经济上的各种混乱现象，政治上的一些腐败现象，分配上的不公现象。以及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政令执行、法律效力、物价工资、教育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混乱现象和问题，量大而面广，远不是某一环节、某一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各个领域的混乱现象互相钳制、相互影响，以致想单独整治哪个领域的混乱现象都不大可能。

但是，仔细分析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混乱现象，背后有一个总根源，这就是社会思想出了毛病。社会思想，包括干部思想和民众思想，两者都出了毛病，但首要的是干部思想出了毛病。社会上发生的任何混乱现象，任何非法行为、非份行为，如像“官倒”、“私倒”、投机诈骗、贪污受贿、贪赃枉法、执法犯法等等，无一不是在人的不良思想支配下干出来的。

社会思想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信仰危机、信任危机、道德沦丧、私欲膨胀，利己主义爆炸。人们思想上丢弃了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三大约束，即信仰约束（既不信马列，也不信宗教鬼神）、道德约束（既弃掉了共产主义道德，也弃掉了封建主义道德）和法制约束（执法不严，有法无吏）。变成了无拘无束、为所欲

为，一切活动受一种自然欲望的驱使。因此，我们社会上就表现出一种弃义追利、弃公循私、弃精神追物质、弃道德追私欲的趋向。

一个十亿人口的社会，失去必要的约束怎么得了呢？人们不顾公利、都拚命追逐私利怎么得了呢？正是由于社会思想出了问题，使得我们无论整治经济秩序还是整治政治秩序，都难度较大。而且往往是治此出彼，打击一个又出多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可以把社会思想看做是产生社会现象的种子，尽管种子本身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同化和凝结了社会环境的成份，但是它既然成为种子，就决定着现象。我们常说，治理社会不良现象，要铲除滋生它们的土壤；实际上，与其铲除土壤，不如汰除种子。也就是说，我们若想整治社会环境和秩序，必须从治理社会思想入手。

二、社会思想发生问题并日见严重的原因

1. 建国以来我们的思想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严重问题。主要为四大问题：

① 没有重视社会道德教育，因而没有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道德。一是建国后谦虚谨慎、兢兢业业、警惕腐败的思想不够。虽然曾经提到警惕进城后“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和防腐蚀的问题，但是实际做的远远不够。与历史上某些明君掌权后那种兢兢业业、谨防腐败的精神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而尤其是，我们只注意了外界腐蚀、忽视了自己本身会产生腐败的问题。二是我们同阶级斗争学说取代了全部道德教育，实际上影响了道德教育。我们提倡共产主义理想，号召人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停留在号召、要求阶段，并没有形成道

德规范。三是各级学校没有开设社会道德课程，干部考核、任免也没有建立道德标准（当时的所谓政治标准不等于道德标准）。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我们不仅没有建立起更高级更稳固的道德风尚，而且反使社会原有的道德水平日渐下降。

② 左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失灵。建国后的十七年中，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教导和号召是言听计从、一呼百应的。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一味搞“穷拔高”、“假大空”，造成了三脱节、三导致：口号与实际脱节（大提不符合实际的口号导致人们对教育、号召乃至政令的不听，后来发展到“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精神与物质的脱节（强调精神万能、忽视物质利益，导致了人们弃精神追物质、弃义追利、一切向钱看）公与私的脱节（只强调人们为公，不注意个人利益，导致了人们弃公益追私利、损公肥私、个人私欲膨胀）。这样，最后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失灵，宣传教育、批评表扬的失效。

③ 弄虚作假和假话风造成了社会的信任危机，产生了社会逆反心理。长期以来，我们的各级领导总是喜欢听顺耳之言、不听逆耳之言；愿让报喜，不愿让报忧；愿讲成绩，不愿讲问题。于是造成了宣传上的穷拔高，工作上的搞形式，汇报上的搞虚假，说假话成风。久之，造成了社会的信任危机，产生了社会逆反心理。凡是宣传形势大好，人们就认为一定是形势有问题；凡是强调团结，人们就认为领导班子有子分歧；凡是上级表扬的人，人们就藐视他；凡是上级批评的人我们就同情他；甚至形成，凡是领导反对的我就拥护，凡是领导拥

护的我就反对。这种社会心态如何领导，如何教育？

④ 思想上的只破不立导致了信仰危机。多年来我们在思想领域强调“不破不立”，“存字当头立在其中”。于是宗教信仰基本破除了，对鬼神的迷信破除了，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也基本破除了。我们想立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信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后来还很快丢失了。于是出现了信仰真空，发生了信仰危机。

宗教尚有一定的劝人为善的作用，信宗教、信鬼神的人要做坏事他还有一种顾忌、产生一种自我约束，如果什么信仰也没有，他做任何事情就没有顾忌、没有自我约束了，怎么能不混乱呢？

以上几点说明：由于我们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就给社会思想变坏和利己主义爆炸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土壤。

2. 吏制不善埋下了不良思想的种子。所谓吏制不善，就是不能做到用贤去佞。社会思想变坏是社会现象混乱的种子；而干部思想变坏，又是社会思想变坏的种子。产生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因为干部队伍中存在总想搞这些东西的干部，是因为一些干部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低下，造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的吏制建设没有搞好。这一方面是我们旧有的干部制度没有坚持好，使之变了质、走了样。建国以后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制度，这套制度虽然并不先进，但是只要坚持遵谱办事，也能作到选贤任能；问题是我们没有坚持好，较快地变了质、走了样。例如，党委集体讨论任命干部，变成了个别领导人任命干部；以个别谈话方式考察干部，变成了先有内定，后走

形式等等。另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及时建立一套先进的、科学的干部制度。建国初期乃至到六十年代，干部队伍的思想和作风是较好的，如果在当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容易），将会保持和发扬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结果是在当时有利的条件下没有建立，及至现在干部的思想严重不纯、严重混乱之后，再要建立反而困难了。

吏制一滥，使品质不好、私心严重的人爬上了领导岗位：说假话、搞形式、报喜不报忧、邀功诿过的干部上来了一批；靠政治运动投机整人的干部上来了一批；靠吹吹拍拍、阿谀奉迎的干部上来了一批；靠裙带关系、人身依附、拉帮结派的干部上来了一批；靠行贿送礼、人情关系的干部上来了一批……这些人没有怀着治国安邦之心，而是怀着投机钻营、捞取私利之心。这种心，就是不良社会思想的种子。再遇到适合的条件，它就泛滥为患了。

3. 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为怀有不良思想的人所乘。不容讳言，我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秩序现象，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是加剧了，因此，有人就说这是改革开放造成的结果。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例如前述造成社会思想混乱从而引起各种社会混乱现象的两条基本原因，就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是也不能说与改革开放毫无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环境为社会上的不良思想所乘。有人利用改革开放的环境条件混水摸鱼、钻空子。但是，为什么没有防止被不良思想所乘，其中固有领导和政策上的失误。

失误之一是，对改革开放必备的社会条件估计不足。政治上、经

济上的改革开放，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思想条件、社会道德条件和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就容易出现混乱。尤其是我们在过去长期统管过死和闭关锁国条件下，一旦开放，人们就有一种自然走向极端、走向无政府主义的趋势，对于这点我们注意不够，采取的防范措施不力。我们注意批评克服了保守思想（这是对的），忽视了防止和克服无政府主义。于是社会上一些私心邪欲在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猖獗起来，在短时间内几乎把国家财富挖空。

失误之二是，我们提出或支持了一些容易被人所乘的口号，如像“能人当家”、“有水快流”、“能挣会花”、“时间就是金钱”、“对中央的政策要灵活运用”、“用足用好中央政策”以及到处乱套生产力标准等等。这些口号也有当时一面之理，但极容易被人所乘，成为一些人胡作非为、为所欲为的旗号。

由于以上原因，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就显得社会混乱现象更加严重了。

4. 救弊不力使问题难以遏止。由社会思想问题引起的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混乱现象，党和政府早有察觉，而且采取过不少防治措施，但是总起来说收效不大。原因在于：

第一，对解决这个问题下的决心不大、力量不够。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决心不大、努力不够，是因为各级有官僚主义的麻痹思想。这种麻痹思想认为：“对党风和社会风气要有正确的估计”，“主流是好的，问题是有的，是不难克服和解决的”。于是这种乐观认识代替了真砍实凿的努力。另外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本身就思想作风不正或与

一些人有牵连，而不想解决，不敢解决。

第二，在治理社会混乱现象中，没有抓住社会思想问题这个关键，而总是在经济领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许多人不承认社会问题是人的思想问题引起的（因为我们向来的教条是“存在决定思想”不能思想决定存在）或者即使承认社会混乱现象是由人的思想引起的，但找不到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的办法（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失灵），只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第三，没有抓住干部问题这个关键。即然干部思想问题是社会思想问题的根源，那么干部思想不好，社会思想不可能好。本来干部制度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关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干部制度改革进展最微。虽然在“年轻化”、“知识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选贤去佞这个根本问题上一直没有解决好。这就不仅使一部分干部成为社会混乱现象的根源，而且使党和政府治理社会秩序的意图、政策、措施发生扭曲、受到抵阻、难以实现。

三、治理社会思想问题的方法

1. 几种意见或思路的探讨

目前关于如何治理社会思想问题进而治理社会风气问题，有三种意见或思路：

第一种意见认为，治理社会思想问题，必须使用思想教育（或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理由是：从实践上讲，过去我们法律、制度并不多，靠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能够把社会思想治理得较有秩序。近年来运用法律、制度的方法和“打击”、“惩办”的方法，并没有收到显著

效果。并不是立法建制越多，社会混乱现象越少；而是立法建制越多、社会混乱现象越多。往往是治此出彼，打击、惩办一个又出多个。从理论上讲，法律制度，对人起一种强制作用，从根本上说，它不解决人的思想问题。而且如果干部、群众的思想作风不好，法律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尤其是执法、掌制的干部，如果思想作风不好，就会执法不严、执法犯法。法制的威力就会丧失殆尽。古人对这个问题写有论述：“徒法不足以自行”，“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因此，治理社会思想问题，必须使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必须恢复和发扬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

但是，思想教育（或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为什么失效？在目前怎样把失效的思想教育（或思想政治工作）变成有效？持这种意见的人却拿不出有力的答案来。

第二种意见主张治理社会思想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理由是：从实践上讲，思想教育或思想政治工作，已基本失去效用。不管是空洞乏味或生动活泼的宣传，也不管是说做脱节或以身作则的教育，都已失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借助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理论上讲，社会思想和社会风气发生问题，是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是法制不健全造成的。如果社会上出现谁遵法守制谁就吃亏，谁胡作非为谁就得到好处，谁还坚持好思想呢，思想教育怎么会起作用呢？因此，治理社会思想问题，必须用法律和制度来劝善止恶。使全社会的人谁干好事谁得福，谁干坏事谁得祸，这样人们的思想才能逐渐变好。

但是，法律和制度也有它解决不了的难题：一是有些社会思想问题是法律和制度所包括不了、约束不了的。例如，工人的主人翁思想（积极性和爱护设备等），医生的服务态度和医疗价格等。二是在社会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单纯用法律制度同不良思想作斗争、往往形成“你有规定，我有对策”，对策胜于规定。三是前述“苟有贞观之法而无贞观之吏”，会形成执法不严、执法犯法。这些，都是法律、制度自身所解决不了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法律制度与思想教育同时并举、互相结合。理由是：两方面的力量大于一方面的力量；综合运用可以互补、互促。

但问题是，如果两方面都存在根本缺陷，那么同时并举、互相结合，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我们现行的做法就是法律制度与思想教育同时并用，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原因就是法律制度和思想教育二者自身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综合上述三种意见，对于治理目前的社会思想问题，都显得软弱无力。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另开思路。

2. 具体方法步骤：

① 要下决心、下力量。前已提到，几年来我们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秩序发生混乱并难以遏止，原因之一是救弊不力。而首要的是下的决心不大、下的力量不足。社会思想问题、下的力量不足。社会思想问题，发展积累到目前程度，非一日之寒，改变它已成为一个巨大工程。它的艰巨性，起码不亚于国民经济工程。要改变它，必须有与它相匹配或超过它的力量。任何一项工作，取得的进展或成就，都等于

人对这项工作投入的有效意志量。治理社会思想问题，也必须投入相应的、足够的意志量。今天，到了痛下决心、下最大力量的时候了。

② 要找到一个起步点。目前我国的社会思想问题有两大特点：一是它已经积累成为一个巨大社会工程，要想解决它除了有相应的决心和力量之外，需要找到一个撬开它的支点。二是正处于一种非良性循环之中，即：社会思想越混乱，思想教育和法律制度越不起作用，而思想教育和法律制度越不起作用，社会思想就越混乱。要解决它，必须找到改变这种非良性循环的转换点。

无论是寻找支点还是转换点，关键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持思想教育意见的人，认为问题的症结在教育；持法制意见的人，认为问题的症结在法制。两者都没找对。我国社会思想问题的真正症结是干部队伍的素质，主要是政治素质或道德素质。因此，治理社会思想问题的起点是清吏制，。古代叫做用贤去佞。

可以说现在出现的各种社会失序现象或混乱现象，是佞者干扰的结果。必须通过用贤去佞，事情才会顺过来，非良性循环才能逐步变为良性循环。不是教育不听吗，实际上不是都不听，而是不听者和想听者间杂，使想听者无法听。清吏制就是汰除不听者、选出想听者而重用之，这就把教育无效这个难题解决了。不是法制不灵吗？实际上不是都不希望法制，而是破坏法制者与希望法制者间杂，使希望法制者在破坏法制者的干扰下失去希望。清吏制就是汰除破坏法制者、选出希望法制者而重用之，这就把法律不兴的难题解决了。

③ 清吏制。清吏制（或称干部制度改革）是治理社会思想问题

的起步点，也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但是，清吏制是一场革命，是对社会进行一次重大手术。既然是一场革命，就要革掉一部分不良干部的政治生命，任用道德高尚、专心治国的贤者，去掉心术不良的小人和不学无术的庸人。这正是事情的难点，需要痛下决心，并有正确的方法。

清吏制决不能用发动群众搞运动的方法，也不能由中央发文件（定政策，立标准）让各级政府去搞。必须从中央开始，自上而下一级一级的进行。

清吏制的目的是用贤去佞，进而理顺整个社会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特别要注意下述两点：

一是要建立起公正、廉洁、有威望的干部人事机构和人事监察机构。首先是建立全国最高干部人事机构和人事监察机构。由中央选任道德高尚、才能出众、专心治国的贤者，负责组建最高干部人事机构和人事监察机构——或者重新建立、或者对原来的组织人事部门和人事监察部门进行严格清理整顿。总的原则是达到用贤去佞。然后是建立省、县各级干部人事机构和人事监察机构。省以下人事机构由上一级人事机构负责组建或整顿。从全国最高、到省县各级干部人事机构和人事监察机构，都必须做到：用贤去佞；建立全面、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程序；干部犯重大错误追究有关干部人事部门的责任。

二是要特别强调干部的道德标准。首先是干部人事部门和人事监察部门的干部，必须有严格的道德标准；然后是其他干部的任用，也都有严格的道德标准。

由此，可逐渐达到绝大多数官吏贤良、清廉。从而成为推动社会思想由非良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化的原动力。

④ 建法制。清吏制这个关键问题解决之后，然后是确立严格的法律制度。只有在良吏执政的条件下，法律和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才发挥作用。法律和制度是良吏进行治理的工具。良吏固然重要，工具也必不可少。就像生产力由人和生产工具构成一样，人的素质极端重要，生产工具也不可少。其实说到底、工具是人的主观努力的物化状态或积累形态。就像资金是价值的物化状态和积累形态一样。法律和制度也是官吏进行治理的主观努力的物化状态和积累形态。社会思想也好，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也好，它们的好坏程度，决定于人（领导者和人民）的意志在这方面的有效投入量，或者说决定于人在这方面的努力量。所谓人的努力量，就包括当时人的努力程度和以前人的努力的积累部分，即工具（包括法律制度）的作用。人的当时努力，如果不及时地把它变成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它就会很快消逝。因此，治理社会，一方面要在任何时候都要积极发挥人的现时努力，另一方面要及时地、不断地把主观努力用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这就等于把主观努力储存下来，能为以后使用它发挥作用。因此，不论搞物质建设还是搞精神建设，都要使用两种力量：现时人的主观努力和过去积累的努力。搞思想建设，要现时努力和使用法律制度相结合。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朝代的频繁代谢，出现明君就好些长些、出现昏君就坏些、短些，就是完全靠人治、靠当时的主观努力，而不注意积累、不注意用法制固定的结果。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同

样犯了这个毛病。在有利条件下没有确立起一套政治制度尤其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这个教训是非常应当记取的。

⑤ 倡道德。所谓治理社会思想，基本就是治理社会道德问题。因为社会思想问题，中心是社会道德问题。社会道德的本质，是在社会生活中，做为社会的每个成员如何尊重他人、约束自己，尊重公利、克制私利的问题。基本是一种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对整个社会非常重要。它是法律制度外部约束所不能代替的。特别是十亿人口的社会，自我约束就更加必要。我们过去的严重教训之一就是忽视了道德建设（已如前述）因而导致了道德沦丧，出现了诸多社会混乱现象。

我们还要吸收过去讲道德只讲阶级道德、只讲特种社会（共产主义）的道德的教训。既要讲阶级道德、特种社会道德，又要提倡一切社会、一切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即做人的必备道德。

倡道德的具体做法：一是由国家制定全社会的道德规范；二是建立国家干部任用、考核的道德标准和考核方法；三是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开设道德课程；四是录取学生、录用干部以及干部晋级、晋职都与道德水平挂钩等等。这样做，才是真正有效的思想教育。久之，良好的社会道德可以确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可以形成。

⑥ 立信仰。现在世界上所谓信仰，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信仰像道德一样是一种劝人为善的自我约束力量。它借助人想像中的一种主宰命运的全能的神，来监督、约束人的行为。它劝人做好事不做坏事，劝人真诚、勤恳、谨慎，这些对人的生活实践都有实用价值。因此人们认为，信宗教是有用的、有效的。对于这样一种力量，我们不

应排斥不用。过去我们总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是用以麻醉人民、维护统治的。这是腐败了的统治阶级利用和亵渎宗教的情形，不是宗教的本质。

人们会说：我们的社会不信宗教、不信鬼神，信仰的是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只构成人们现实生活的奋斗目标，并不就是信仰，像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政治目标一样，它并不构成信仰。即使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也算做信仰的话，目前也基本被打破了。现在我们社会处于基本无信仰状态。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主要是推崇道德，运用道德的力量。宗教一直不发达。当道德一旦被破坏，社会就发生混乱现象。

因此，我们应当立信仰。立什么信仰？可由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们去研究、创造。我们是否需要创造一个宗教、树立一个偶像，这倒不必。我们完全可以吸收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世界宗教的精华，以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为根据，创立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更富理性更加合理的信仰。

总之，有信仰比无信仰好，信仰的积极作用，我们不能弃之不用。

总括以上关于治理社会思想问题的几点做法是：在有了决心、下了力量并找到起步点之后。通过清吏制，使社会获得公正的管理者；通过建法制，使社会获得一个严格的外部约束机制；通过倡道德、立信仰，使社会每个成员获得一个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有了这三个条件，社会思想就可以理顺，社会失序就会变成有序，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大治。

(1988年11月)

赶快解决华北的水危机

今年一冬，华北基本无雪，长长的冬季，晴暖而干燥。正是根据一冬晴暖无雪，笔者曾预计在冬末春初将有一次时间较长、降水量较大的雨雪。理由是：前期天气的干过程如果强大，后期天气的湿过程亦将强大。到了3月初，天气形势果然到来了。从3月3日开始，天气转阴，一连阴了半个月。但是除了北京市下了一次1~2mm的小雪之外，华北大部地区基本没下（或见了零星小雪）。阴了半月而雨雪不下，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天，下点雪真是难极了。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想起了《易经》上说的一句话：

乾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水就湿，火就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火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它要向布满干柴（蕴含火的同性、同伙）的方向燃烧；革命党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它要向与自己主张意志相同或相近的人群地区发展；水要扩大，或占据自己的地盘，它要向潮湿（蕴含水的同伙）的地方发展。这就是天性、物性、自然之性。因此古人总结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就湿、火就燥，万物各从其类的道理。

近年来，由于人欲横流，颠狂蛮干，不知爱天，不懂节俭。已把环境和资源糟蹋得不成样子、快要枯竭殆尽了。华北地区的淡水危机

就是最严重最典型的例子。目前华北，几乎所有的河流变成了干河。所有的湖泊，坑塘均已干涸。地面几乎水没有了。仅有的有限的地下水，也被开采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深。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深厚的非常可怕的干土层。庄稼、树木、花草，生长在巨大干土层的表面，已吸不到地中自然之水了，只靠人工提上来的一点水生活繁衍，可以说岌岌可危了。这点地下水还能提取多久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更可怕的是，天上的降水也减少了。由于地面水的干涸，地下水的减少和巨大干土层的形成，按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就湿、火就燥的原理，天上的云雨来到华北想就湿而无湿，它降得下来吗？看吧，今年，从3月3日到今天3月18日，已连续15天阴天了，阴了15天却不降雨雪，这在过去怎么可能呢？不就是由于地面有一个巨大干土层吗？不就是无湿可就吗？天上的云雨降不下来呀！今年整了一冬晴天无雪。本来预计冬末春初将有一次时间较长、降水量较大的雨雪（理由是前期的干过程强大，后期的湿过程亦必强大）。但是，天气形势虽然到来了，本地的条件却不具备，佛学上叫做有因无缘。中国古人称作天地不合。因此，天上有云，地下不雨。就这么阴着天，十多天了，还不下雨雪。

这就是上天给的警示。人的戡天毁地，暴殄天物，如不收敛，岂止天旱不雨？岂止是淡水危机？进一步要发生天火！水无淡可就，火将有燥可趋。华北有变成赤地千里，一片沙漠的可能。观此情此景，不得不强烈呼吁：赶快解决华北的水危机！

（1999年3月18日）

论事业单位的招标承包责任制

一、事业单位实行招标承包责任制是必然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基本形式是实行责任制。先从农业开始，发展到工商企业，现已扩展到事业单位乃至党政机关。这是总的趋势。

实践证明，农业的改革，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结果是一包就活，释放出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后来的工商企业的改革，主要实行的是招标承包责任制。也是一包就活，释放出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大提高；1987年夏季，保定地区把企业的招保承包责任制引入事业单位，先后在学校医院、影剧院乃至计划生育等领域搞试验，结果也是一包就活，充分发挥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工作效率、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加快了事业的发展。这就从社会实践上得出一个简单枚举的逻辑推理：事业单位和农业、企业一样，实行承包责任制具有一种必然趋势。

从理论上讲，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实行基本相同的承包责任制，都收到基本相同的效果，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它内在的机制，这就是解决了人的积极性问题。

多年来，我们的集体农业也好，工商企业也好，事业单位、乃至党政机关也好。它们的通病是：由于体制上的僵化，管理上的落后，使集体人群失去了积极性，使集体事业失去了活力。行为科学认为：

“团体的活动往往会向低水平看齐”，“马经过委员会的安排就变成了

骆驼”。（《行为科学》41页）这种说法未免过甚其词，但这种趋势是存在的。如果再加上“终身制”、“大锅饭”这种领导体制和管理方式。集体人群向落后看齐，集体事业失去活力的现象就会严重起来。

要解决集体人群的积极性和集体事业的活力问题，首先的是解决领导者的积极性和管理水平问题。要解决领导者的积极性和管理水平问题，关键是有有一套选拔积极性和管理水平都高的领导者的方法：还要有一套保证和督促领导者保持积极性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的制度。

多年来，我们无论对企业、事业还是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基本上实行委任制和终身制，缺乏一套严格的责任制和考核制。领导干部的委任制，由于缺乏公开性、平等性和竞争性。在干部选优方面是落后的，保证不了积极性和管理水平最高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管理上由于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和考核制，保持不住领导者最大积极性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的努力。上述两个方面是影响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必须找到改革它的有效办法。

企、事业单位实行的招标承包责任制，利用招标聘任、实行公开平等的竞争，解决了领导者的选优问题。利用承包合同，实行严格的奖罚措施，解决了责任问题。这样，既解决了单位领导者的积极性问题，又解决了领导者的管理水平问题。进而依靠领导者的积极性和高水平的管理，充分发挥集体人群的积极性、集体事业就获得了活力和发展。

因此，实行招标承包责任制，不仅是企业单位而且是事业单位必然的和最佳的改革形式。

二、招标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内容

实际上的招标承包，有多道具体程序。如：建立组织、制定方案，自愿报名，演讲答辩，群众评选，专家评鉴、领导审查，签订合同等等。但是其基本内容是两块：一是招标聘任单位领导者，二是签订承包合同。

招标聘任，解决优选领导者的问题；承包合同，解决目标责任制问题。有了好的领导者，又有严格的责任制，工作效率的提高和事业的发展就有了保障。

农业上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是由集体经营改为个体户经营，所以只要承包责任制这一块就行了，不需要招标聘任领导者。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需要保持集体经营或集体管理，所以除了承包责任制之外，还有个招聘领导者的问题。由于企业与事业单位又有不同，所以企业的招标承包与事业单位的招标承包在要求、做法和程序上又有所区别。

招标聘任这一块，关键是要体现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设公开平等的舞台，让人才自己站出来竞争，然后按公开、统一的评分标准择优确定承包者。为此，要重点抓住以下两点：一是要引入专家组进行考核和评鉴。因为专家在人事关系上比较超脱，同时有认真的态度和评鉴的能力。做为考核者和评鉴者，在现存可供选择的人选中，专家是最佳的人选。二是要有群众的参与，由招标单位的干部、职工参加质询和评选。这是招标聘任必须具备的民主和监督内容。

招标聘任，不仅能为单位选拔优秀的领导者，而且是一项非常深

刻、非常现实的人事制度改革。它通过变人才个别发现为公开竞争，变静态考核为动态考核，变领导印象为专家评鉴，有效地解决了干部任用上的选优问题；它通过投标者自愿报名、自报指标、自认奖罚。真正解决了领导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问题；它通过群众参与、专家评鉴，体现了干部选拔上的公开性、民主性、科学性，提高了干部选拔工作的社会声誉。

合同承包这一块的关键，一是要制定一套客观、合理、便于考核的承包指标体系，以保证合同的兑现和责任制的落实。二是要注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以防止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合同承包，不仅是单位工作效率和事业发展的保障。而且是把事业单位的管理，引向法制化、科学化的有效形式。它通过签订承包合同，就自然地实行了目标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不是上级让订的，而是承包者自己制定的；不是笼统、含糊的，而是逐条逐句经过推敲并有具体奖罚规定的。而且合同经过了公证、有法律效力，使目标责任制找到了落实的有效办法。同时，由于合同上有任期年限和解聘条件的明文规定，便顺理成章地解决了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能上能下的问题。

三、推行招标承包责任制应注意的问题

1. 事业单位的招标承包，既要加快进度，更要注意质量。从实践中体会到：一项改革，一件新事物，开始时人们不愿接受，到大家都纷纷搞起来的时候，往往在轰轰烈烈之中把事情办走样。有人说：

“在中国新鲜事儿没几天就会流为形式。”这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的。

有些主管部门的领导，对招标承包不理解、不赞成，习惯于按个人意志选配下属领导或下达指令性任务，当迫于形势不得不搞时，一搞就走样。不是缩小和限制报名范围，就是渗透“领导意志”，以致造成招标承包信誉扫地。有的部门领导，并不真正理解招标承包的意义，只是为跟形势、赶浪头，工作不细、程序不全、简单从事。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承包化”，结果质量不好，甚至做成“夹生饭”。

因此，目前事业单位的招标承包要特别注意质量，防止各种偏向，要稳扎稳打，搞一个成一个，不能大轰大嗡。

2. 招标聘任领导者要坚决贯彻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防止掺入“长官意志”和感情因素。招标择优选拔单位领导者，是人们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合同承包这一块，甲乙双方及广大群众较易接受；招标聘任这一项，人们的想法颇多。广大群众最关注的是，看你是否真正实行公平竞争。群众说：“这评那评，就怕早有内定”，“这组那组，就怕还是领导说了算数”。而有些部门的领导所关心的则是自己心目中的人是否能选上。他们怕“不可靠的人”夺标，怕自己心上的人被选下来或上不去。于是他们或者不搞招标聘任，只搞合同承包，或者在招标聘任中“施加影响”。从而造成招标承包信誉扫地，影响极坏。经验告诉我们：往往一项新工作开始不久就有不正之风侵入，我们事业单位的改变，必须高度警惕，防止不正之风的侵扰。

3. 要制定一套规范化的招标聘程序和承包指标体系。由上级体制改革部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完全式和不完全式的招标承包都搞出

一套规范化的招标程序和承包指标体系，很有必要。既为事业单位招标承包提供方便、有章可循，又有利于保证招标承包质量。没有一套规范化招标程序和承包指标，人们就无所遵循，极容易把招标承包责任制搞乱。事业单位，在招聘领导者方面，较之企业更注重政治素质和政绩；在合同承包方面，较之企业，软指标较多，更注重社会效益。因此，掌握起来，难度更大些，更需要严格的程序和科学的指标体系。

有了一套招标程序和承包指标体系，使大家只要按照规定去做，就能贯彻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从而选出单位的最佳管理者；就能使承包合同订得科学合理，便于考核、兑现，从而保证事业单位既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又有高的效率和效益。

4. 事业单位的招标承包要特别注意社会效益。这涉及到事业单位的方向问题，也是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例如，医院的承包，群众就十分关注，他们怕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费用上涨。因此，在招标承包工作中要着重解决好事业单位的社会效益问题。目前，在招标方案和承包合同中，有经验效益指标较硬而社会效益指标较软和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倾向。解决的办法，一是主管部门在招标承包工作中有意识的注意这个问题，二是在标的合同中规定较硬的、可考核的社会效益指标。

5. 搞好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配套改革。一是单位实行招标承包以后的内部深化改革，一般是实行内部的层层聘任承包。这一步搞好了，事业单位的活力、工作效率才能大大提高。上级领导和体改部门应先搞试点，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二是人事制度上的配套改革。主要是人事部门要帮助承包后的事业单位实行规定的人事管理权，并解决干部、人才流动问题。承包者急需的人才，应帮助调入；承包者认为应该辞退或调出的人员应帮助调出。

三是工资和资金制度上的配套改革。实行招标承包后，承包者和单位干部职工的责任、压力和积极性、工作量都成倍增加，因此，工资、资金必定也要增加，这需要财政、税务和审计部门相应制定合理的工资、资金改革方案，以促进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巩固改革的成果。

(1988年5月)